

中國古代文論精粹選

牟世金
羅宗強
張連第

蕭洪林
吳存存
鄔國平



鲁新登字 07 号

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

牟世金 萧洪林
罗宗强 吴存存 著
张连第 邵国孚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823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50

ISBN 7-5333-0259-1

I·95

定价：7.40 元

目 录

刘勰和文心雕龙	牟世金 萧洪林 (1)
一、序言	(1)
二、刘勰的生平和思想	(4)
(一) 刘勰的一生	(5)
(二) 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奉时骋绩”的幻想	(12)
(三) 与统治阶级不很吻合的文学思想	(15)
(四) 信仰佛教与标榜儒家	(19)
(五) 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27)
三、枢纽论	(38)
(一) 原道论	(39)
(二) 征圣论	(47)
(三) 宗经论	(50)
(四) 《正纬》和《辨骚》	(52)
(五) 简短的结论	(56)
四、理论体系	(58)
(一) 子书还是文学理论著作	(60)
(二) 写作目的与理论体系	(64)
(三) 组织结构和理论体系	(67)
(四) 以心为主导的心物交感	(77)
(五) 以情为中心的情采相胜	(85)
五、文体论	(98)

(一) 原始以表末	(102)
(二) 释名以章义	(105)
(三) 选文以定篇	(108)
(四) 敷理以举统	(109)
(五) 简短的结论	(112)
六、创作论	(115)
(一) 创作论的总纲	(119)
(二) 擒神、性	(125)
(三) 图风、势	(128)
(四) 苞会、通	(138)
(五) 阅声、字	(148)
(六) 创作论的总结	(153)
七、批评鉴赏论	(155)
(一) 崇替于时序	(155)
(二) 褒贬于才略	(160)
(三) 招怅于知音	(162)
(四) 耿介于程器	(165)
(五) 简短的结论	(167)
诗格、诗式和诗品	罗宗强 吴存存 (175)
第一章 《诗格》、《诗式》和《诗品》	(175)
第一节 《诗格》、《诗式》和《诗品》产生的背景	(175)
第二节 《诗格》、《诗式》和《诗品》的作者和版本 流传情况	(181)
第二章 意境论	(193)
第一节 《诗格》的意境论	(193)
第二节 皎然的意境论	(200)
第三节 司空图的意境论	(206)

第三章 “文外之旨”说	(211)
第一节 《诗式》的“文外之旨”说	(211)
第二节 司空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说	(216)
第四章 风格论	(225)
第一节 《诗式》的风格论	(225)
第二节 《诗品》的风格论	(233)
第五章 艺术辩证法思想	(255)
第六章 写作方法论	(267)

严羽和沧浪诗话	张连第 (277)
一、家世交游	(278)
二、生平活动	(282)
(一) 关于严羽的生年	(282)
(二) 避乱返乡与二次出游	(285)
(三) 羊裘渔钓, 寂寞以终	(294)
三、思想性格	(298)
四、诗歌创作	(304)
(一) 抒怀叙志, 遗恨终生	(307)
(二) 感时伤事, 忠愤忧国	(308)
(三) 羁旅孤苦, 思乡怀友	(310)
(四) 登临记游, 抒情状物	(311)
五、《沧浪诗话》成书与体例结构	(313)
(一) 《沧浪诗话》的成书	(314)
(二) 《沧浪诗话》的体例结构	(316)
六、理论主张	(322)
七、批评实践	(342)
八、结束语	(353)

竟陵派的文学理论	邬国平 (361)
一、一个新的诗歌观念	(361)
二、改造二派，自成一家	(377)
(一) 信心信古	(377)
(二) 重情重理	(387)
(三) 求灵求厚	(397)
(四) 新的扬弃	(403)
三、《诗归》面面观	(416)
(一) 选诗的特点	(416)
(二) 论诗人、风格及诗歌创作	(426)
(三) 叙事诗理论	(438)
(四) 鉴赏批评的主张和实践	(443)
四、散文创作理论	(458)

刘勰和文心雕龙

牟世金 萧洪林

一、序 言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十分丰富，《文心雕龙》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周扬同志曾精确地论述其典型意义：“特别是《文心雕龙》，在古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著作。”^①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相当全面地总结了从先秦到晋宋一千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概括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基本文学面貌，评论了此期重要作家两百多人，逐一论述了当时所有的

^① 《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文体三十五种，更全面探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鉴赏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所以，《文心雕龙》在古代文论中，确是内容最丰富的。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如此庞杂的内容，在《文心雕龙》中不仅组织得井然有序，而且由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四大部分，构筑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它的系统性在古代文论中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文学史家评此书为古代文论中“空前绝后”之作^①，仅从《文心雕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可知，此评是并不为过的。

产生于公元五、六世纪之交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是“勒为成书之初祖”^②，在世界文坛上，也确如周扬同志所说：“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在《文心雕龙》之前，中国古代只有《典论·论文》和《文赋》等单篇文章是论文的，且只粗略地论及某些侧面；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虽是文论方面的专书，但它只论文体，且其书早佚。从全世界来看，周扬同志在上引同文中指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然比《文心雕龙》产生更早，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古罗马则有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吉纳斯的《论崇高》都比《文心雕龙》早，但都不如《文心雕龙》完整绵密。”所以，《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早的典型，也是世界文学理论最早的典型，很值得我们珍视。

正因《文心雕龙》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愈来愈为中外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注视。《文心雕龙》研究近年被文学界广泛称之为“龙学”，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称，而是近代龙学的诞生，一开始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早在七十多年前，刘师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314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培、黄侃就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其后，不仅范文澜、刘永济等相继在各大学开设此课，1925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也由铃木虎雄开设《文心雕龙》课。至今，国内外大专院校开设此课者已相当普遍。作为一门大学的课程，这是龙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而龙学的范围，并不仅仅是一本《文心雕龙》，它广涉文学史、文艺学、美学、经学、玄学、子学、佛学以及版本、校勘、注译等，已形成一整套系统化的学科。近八十年来，研究龙学的论著愈来愈精深繁富，国内外已出版各种专著一百多部、发表论文约一千六百多篇，成为当代古代文学方面的显学之一，且正以日新月异之势，迅速向前发展。

一部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何以为当今中外学者如此重视呢？我们现在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并大力推进龙学的发展，有什么必要性呢？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试图说明的问题之一。

我们祖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古代文论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的当今学者，尚图通过《文心雕龙》这个典型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我们自己岂能割断历史而置之不顾？文学艺术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养料而向前发展的。《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卓越成就，就不仅接受了当时新兴的玄学思想、儒道佛相互融汇的成果，也与外来的佛学、因明学密不可分。发展今天的文学艺术，自然更应吸收一切外来有益的东西。但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文学、民族文学，而不是欧美文学、苏联文学。完全抛开自己的优秀传统而全盘西化，那就是从零开始，不仅只能学舌人后，且如邯郸少年，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民族多年来的正确结论，文学艺术也不例

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是当前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文心雕龙》既是古代文论的典型，其中自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中国的文学观、文学评论，是怎样从先秦发展到今天的，有何自身的规律、民族的特色等，我们都可从这部典型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启示。此外，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美学、文学史的研究等，《文心雕龙》也是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正因如此，龙学才逐步走向世界，成为当今显学之一。

《文心雕龙》体大思深，内容复杂，加之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研究者历来分歧较大，我们这本小书，很难作全面详尽的介绍。本书主要是对《文心雕龙》和古代文论的初学者、爱好者，提供一个入门的通俗读物，兼顾一般大专院校的同学自学之需和选上此课者的参考。因此，除对《文心雕龙》作概括性地全面介绍外，力求突出重点，对其中关键性的问题、理论价值较大、在古代文论中有普遍意义的内容，特别是既重要而又有争议的论点，尽可能作较详的评价。我们希望通过此书，既使读者能了解《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及其价值，又初步掌握正在迅速发展中的龙学现状。为便于读者自己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将适当介绍各家的一些不同见解，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刘勰的生平和思想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可与西方亚里斯多德《诗学》媲美的东方古代文学理论杰作，产生于南朝齐、梁之际，出自刘勰

之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历史因素汇成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它是文学自觉的产物，是适应创作的繁荣和扭转当时文坛不良倾向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又是刘勰之前千余年间文学理论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因而是文学理论思想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刘勰博览精研、苦心经营的结晶，凝聚着他精心建构的心血和托心千载的殷切希望。

（一）刘勰的一生

刘勰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梁书·刘勰传》。《南史·刘勰传》是据《梁书》删改而成，虽无新的内容，其删正之处，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史籍中也偶有记载。以上记载都很简略，其生卒年代和有关事迹的时间，均史无明文。经刘毓崧、范文澜、杨明照诸家长期考证，现已得其大概，但仍存在一些分歧，迄无定论。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自己的索考，简述刘勰的生平如下。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这是他的祖籍（今山东日照县）。西晋末年，晋室南渡，刘勰的祖上可能同时过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父名尚，是刘宋时的越骑校尉。《梁书·刘勰传》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如果刘灵真是刘秀之之弟，则据《宋书·刘秀之传》等推算，刘勰不仅出身世家大族，且是汉高祖刘邦之后。研究刘勰身世者多取此说。自王元化开始^①，不断有人怀疑刘勰与刘秀之是否同宗，因晚于《梁书》的《南史·刘勰传》，删掉了“祖灵真，宋司空

^① 《文心雕龙创作论·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秀之弟也”一句，而南朝诸史，又无此两家关系的任何记载，特别是从刘勰一生的思想行事来看，他与宋、齐以来刘穆之、刘秀之等刘姓贵族并无关系。刘灵真的事迹诸史不载，可能没有出仕。刘尚只做了官品不高的越骑校尉而过早去世。由于刘勰出身庶族，到他的少年时期家道更为衰落，以至如本传所说，“家贫不婚娶”。在士族制度森严的南朝，给刘勰的一生带来极大的不幸。

刘勰的生年，持说不一，迄今所见已多达十余种，最早者以为生于公元460年左右，最晚到472年^①。我们认为当以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所考，刘勰“生于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为近是^②，这两年又以生于泰始三年（467）的可能性较大。刘勰七岁时，曾“梦采云若锦，则攀而采之”，这是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讲的。既然是为叙述其志而写，则这个梦不是无意写到的。古人以五采祥云为吉兆，刘勰又能攀而采得，显然意在表示自己少有奇志，且自幼就满怀壮志。于此可知，刘勰的父亲这时还必然健在，小康之家，还可使他有充分的信心必将学有所成。不幸的是第二年（474）五月，宋桂阳王刘休范举兵攻入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建康发生一场十分激烈的攻守大战^③，右军将军王道隆、领军将军刘劭等战死，幸有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杀了刘休范，建康之危始得平息。刘尚也是当时的越骑校尉，既身为军校，岂能置身战乱之外？他很可能是战死者之一，以职微而无功，所以史书未载。本年刘勰

① 详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以下系年亦据此考。

②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③ 这一激战的详情，参见《资治通鉴·宋纪十五》。

八岁，若刘尚晚死二三年，则与本传“早孤”之说不符，故知刘尚必卒于本年。从此，刘勰的家庭生活逐渐转入困境。但本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庭的不幸，并未改变其勤奋好学的素志。特别是肖道成于479年（刘勰十三岁）建齐之后，很快就进入魏晋以来的“儒学大振”时期。这时的刘勰，正当“志学”之年前后，时风对他宗儒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约二十岁时，刘勰的母亲去世了。在他居丧的第二年（永明五年），竟陵王肖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一方面招致名僧，大讲佛法；一方面汇集文学之士，形成沈约、谢朓、王融等“竟陵八友”的文学集团。诗风与佛教同时兴盛起来，《南齐书·肖子良传》所谓“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确是史实。这种盛况，对二十二三岁的刘勰必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三年丧毕之后，第二年（490）便离开京口到建康寻求出路。但一个出身寒门以至“家贫不婚娶”的小青年，在当时的“济济京城内”，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虽然当年四月齐武帝曾下诏：“公卿已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南齐书·武帝纪》），很可能刘勰正是闻讯而来；但刘勰之才既未曾显露，公卿已下更无所知，历史给他安排的道路只有一条：寄身佛门。从永明七年（489）十月到本年初，肖子良招集京师硕学名僧数百人在普弘寺讲佛。其中曾请当时著名佛学律师僧祐讲律^①，此人兼通佛儒，广交朝贵，是深受齐梁帝王礼遇的一位高僧。故刘勰投其门下，以白衣身分（不受戒入教）住钟山定林寺，一方面协助僧祐整理佛经，一方面利用佛寺藏书较多的条件，继续研读

① 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略成实论记》。

经史百家的著作和历代文学作品。更主要的则正如刘勰自己在寺内所说：“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既为仕进创造条件，亦以等待出仕的时机。

刘勰在定林寺的耐心等待，是一个长达十余年的漫长时期。大致前六七年内，以主要精力协助僧祐编撰佛经，间以研阅经史百家和文学作品。《梁书》本传说刘勰在定林寺期间，“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其所完成之经录与序文，因是佐僧祐而为，均署名僧祐，故僧祐之《释迦谱》、《世界记》、《三藏记》、《法苑集》、《弘明集》等的整理及其序文，必多出刘勰之手。大约到建武四年（497）左右，助僧祐整理佛经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刘勰在本年前后，撰成了收入《弘明集》的《灭惑论》。《灭惑论》的撰写时间，杨明照以为在《文心雕龙》之前^①，王元化、李庆甲、李森等以为在撰成《文心雕龙》之后的梁天监年间^②。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弘明集》序目，当以杨说为是。今存《弘明集》十四卷，是梁代增补而成；《三藏记》所载《弘明集》为十卷，显然是完成于齐的初编本。此十卷之目录，计收二十九家之文共六十篇，其中汉代牟子一人，晋代孙绰、道恒等十三人，宋代宗炳、颜延之等九人，其余六人为明僧绍、周颙、肖子良、僧肇、玄光、刘勰。此前四人为齐人甚明，唯玄光一人无考，严可均收其《辩惑论》一文入《全齐文》卷二十六，

① 见《刘勰〈灭惑论〉撰年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

②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灭惑论〉与刘勰前后期思想变化》，李庆甲《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辨》，《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李森《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二期。

当亦齐人。这样，十卷本的《弘明集》既全为齐以前之作，就不可能编入一篇梁代之撰^①。

从现在尚存的《灭惑论》可知，刘勰在写《文心雕龙》之前，佛教思想对他已有深刻的影响。《梁书》本传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如当时高僧超辩、僧柔等的碑文，都是刘勰撰写的^②，且都在刘勰开始写《文心雕龙》之前。但到刘勰三十二岁时，却夜梦捧着红漆的祭器，跟随孔子南行。醒来后，刘勰十分得意，认为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圣人，这样难见的圣人，竟投梦给自己这种无名小子，岂不光荣。因此，他决定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教诲来撰写《文心雕龙》（见《序志》）。由此可见，刘勰这时的思想仍以儒家思想为主。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因刘勰虽身在佛门，也受到不少佛教思想的洗礼，但他长期“笃志好学”的，主要还是儒家经典，所以才有此梦，并以此梦为荣。当然，其“为文长于佛理”对建立《文心雕龙》完密的理论体系，也是很有助益的。

从三十二至三十六岁（498至502年），约经四年的努力，完成了《文心雕龙》。502年四月，齐和帝禅位肖衍，从此进入梁武帝天监元年。经多数研究者考定，《文心雕龙》完成于齐末，即本年四月之前。由于刘勰名位不显，书成之后，未能即时引人注意。刘勰既出于自信，又以出仕心切，便想请当时文坛显贵沈约予以评定。但刘勰没有资格正式拜见政治地位很高的沈约，便背着书稿，扮成售货者，在沈约车前挡驾献书。沈约读后大为重视，做了“深得文理”的高度评价，并把这部书放

① 详见《刘勰年谱汇考》。

② 见慧皎《高僧传·超辩传、僧柔传》。

在自己的书案前经常翻阅。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由此而渐为世人所知。

正以得沈约之力，三十七岁的刘勰于天监二年开始出仕为奉朝请。但奉朝请只是奉朝会请召而已，还不是正式的官职。到第二年初，才被中军将军临川王肖宏引为记室，管理文书。刘勰到这时才离开托身十四年之久的定林寺，进入仕途。天监四年十月前，刘勰改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管理仓账，到天监六年六月，因夏侯详改任右光禄大夫而离仓曹参军之职。其后不久，出任太末（今浙江龙游）令。刘勰任太末令三年，史称“政有清绩”（《梁书·刘勰传》），说明他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天监十年（511）刘勰四十五岁，改任仁威将军南康王肖绩的记室，并兼任昭明太子肖统的东宫通事舍人。通事舍人职掌章奏，虽品位不高，时为清选之任。但直到天监十六年肖绩改为宣毅将军、领石头戍军事之前，刘勰并未入东宫，而以任肖绩的记室为主。天监十六年离肖绩记室之任而入东宫，开始了刘勰仕途上最幸运的时期。《梁书·刘勰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主要就在这个时期。

由于梁武帝崇信佛教，所以从天监十六年冬的宗庙祭祀开始，不用牛羊而改为蔬果。刘勰继而上表提出，天地、社稷之祭，同样也应改用蔬果。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刘勰可能因此于天监十七年（即上表后不久）提升为步兵校尉，管理东宫警卫工作，继续兼任通事舍人。当时官分九品，刘勰在此以前所任记室、参军以至通事舍人，都属最低的八、九品小官，而步兵校尉则位列六品，虽仍是低级官吏，却是一大升迁。但刘勰的仕途不仅到此为止，未能继续上进，且步兵校尉之任也不过一年就结束了。据《隋书·百官志上》载梁代官制：“其屯骑、

步兵、翊军三校尉各一人，谓之三校。”是知步兵校尉定员为一人，而《梁书·谢举传》说谢举于天监十八年“复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可见天监十八年的步兵校尉就由谢举继刘勰而兼领了。

刘勰离职的直接原因，是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五月。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①可知，他一生好搜集经卷。早期所集，刘勰在定林寺期间已协助他整理就绪。刘勰出仕十五六年来，僧祐又继续搜得大量佛经，他去世之后，须即时加以整理。《梁书·刘勰传》说：“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就是指此而言，其时即在天监十八年。这次奉命返定林寺撰经，当非数月可毕，而步兵校尉事关东宫安全，及时易人就是很自然的了。但经一二年功毕之后，刘勰未受新职，这就可能与他的出身门第有关了。六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制是十分森严的。梁代用人虽时有寒素，但从《隋书·经籍志二》所录梁代大量家谱可知，谱牒之风，可谓盛于是时。而谱牒的编撰，正在区别士庶，以为选官授职的依据。《南史·王僧孺传》载：沈约曾以“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士庶不分，杂役减阙”等，请梁武帝明辨士庶。“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王僧孺撰《百家谱》三十卷，就正在天监十八年或第二年普通元年。既因士庶不分而使“州郡多离其罪”，刘勰适当其风，而又对“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迎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史传》）之类不平现象，也常怀不满之情。其不可能继续上升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刘勰这次回定林寺是故地重游。二十年前，他在这里曾做

^① 见《大藏经》第五十五卷。